

编辑出版史方法论暨刘光裕《先秦两汉出版史论》 学术研讨会综述

章宏伟¹, 黄天怡²

(1. 故宫博物院 故宫学研究所, 北京 100009; 2. 中国社会科学院 研究生院, 北京 102488)

[中图分类号]G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6973(2017)02-0122-07

故宫紫禁城是明清两朝的皇宫,也是众多官书的编辑出版之地。紫禁城西侧的武英殿,清代康熙乾隆时期出版规模巨大,成就斐然,不仅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编辑出版印刷中心,就是在世界范围也无与伦比,一些大型的著作如《康熙字典》《古今图书集成》《四库全书》《清文翻译全藏经》等,都是在紫禁城内分别抄录或刊印的。这里刊刻的大量书籍,无论是对文化传播,还是对印刷技术的革新,都有重要的意义。《钦定武英殿聚珍版程式》是当时出版印刷管理和技术的一个极好见证,当时刻书规模之巨大、印刷技艺之精湛,都堪称在中国出版印刷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故宫博物院今天有180多万件文物收藏,分为25个大类。其中有几个门类与编辑出版史关系密切,关系最直接的是古籍。故宫博物院成立伊始,就设有图书馆,收藏有“文渊阁四库全书”、“藻藻堂四库全书荟要”、天禄琳琅等珍贵古籍善本,后来故宫的藏品几经向外调拨,现在图书馆还有60万件藏品,包括大量的明清内府雕版,保存良好,只要稍加整理,大部分书版都能直接用来印书,是当时雕版的物质见证,对研究有着直接、无可替代的价值。故宫藏品中的《唐写本王仁煦刊谬补缺〈切韵〉》,是存世的唯一一件旋风装实物。故宫学研究所成立以来,编辑出版史一直是研究所的一个主要研究方向,出版发表了不少成果,并曾多次召开宫廷典籍与东亚文化交流等国际学术研讨会,编辑出版史已经成为研究所较有特色的研究领域。

山东大学刘光裕教授是我国编辑出版史研究领域最值得尊敬的专家。刘光裕先生曾两度主持《文史哲》的工作,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研究编辑学,当年由他的一篇《论编辑的概念》开端,开展了一场编辑概念的大讨论,著有《编辑学论稿》《编辑学理论研究》等著作,是中国著名的编辑学家。刘光裕最早倡导编纂中国出版通史,1993年开始策划《中国古代出版通史》。1996年11月,经刘光裕倡议,中国编辑学会与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山东出版总社联合在济南召开“中国古代出版通史编纂工作座谈会”,这是讨论编纂中国出版通史的第一次全国会议。从此,联合全国力量编纂出版通史迈出了实质性的一步。刘光裕先生年过八旬,仍笔耕不辍。新出的《先秦两汉出版史论》,写作花了整整20年时间。在当前整个社会、学界都非常浮躁的大环境下,刘光裕不发空言,穷尽史料,学风扎实,着实令人肃然起敬,足为大家楷模。

2016年10月21—22日,由故宫博物院与中国编辑学会联合举办的“编辑出版史方法论暨刘光裕《先秦两汉出版史论》学术研讨会”在故宫博物院召开,会议收到论文38篇。来自北京大学、山东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南开大学、华中师范大学、中国传媒大学、济南大学、武汉大学、暨南大学、北京印刷学院、首都师范大学、国家图书馆、中华书局等单位的50位专家学者,围绕编辑出版史方法论研究、明清宫廷典籍与故宫博物院出版研究、《先秦两汉出版史论》研究及评价三个主题,开展了深入的研

[收稿日期] 2016-12-20

[作者简介] 章宏伟(1964—),男,浙江温岭人,故宫博物院故宫学研究所所长,研究馆员。研究方向:故宫学。

讨与交流。

故宫博物院故宫学研究所章宏伟所长主持了会议开幕式,简要说明了举行此次研讨会的初衷,介绍了刘光裕先生在编辑学特别是编辑出版史研究上的贡献,以及故宫博物院希望在编辑出版史研究中扮演的角色,对与会专家学者表示了欢迎。故宫博物院任万平副院长、中国编辑学会胡国臣常务副会长分别代表主办单位先后致辞。任万平介绍了故宫在明清两朝编辑出版中的地位,馆藏文物中有关出版编辑门类与珍品,故宫博物院对编辑出版史研究的重视;故宫召开会议讨论刘老师的著作,就是对刘老师的精神、毅力和学风的尊重,刘老师的严谨学风正是故宫博物院一贯的追求。胡国臣说中国编辑学会从第一届刘杲会长开始,就对中国编辑出版史研究给予积极的支持,《中国古代出版通史》启动会,正副会长7位到会,可见支持的力度之大。上一届桂晓风会长领导下组织编纂《中国近代编辑史》。这一届郝振省会长和学会积极支持编辑出版史研究,并对故宫博物院支持编辑出版史研究充满期待。两位领导都对刘光裕先生及其著作《先秦两汉出版史论》表示了高度赞许和祝贺,相信《先秦两汉出版史论》的出版一定会对我国编辑出版史研究产生巨大的影响,推进编辑出版史研究。

刘光裕、陈静、姚新勇、于翠玲、范军、李频、章宏伟先后作大会报告,会议分三组进行了交流与讨论。下面就将会议交流的论文稍作提要予以综述。

一、编辑出版史方法论研究

湖北第二师范学院芦珊珊《先秦古籍〈诗三百〉编辑思想研究》指出,探究《诗三百》的编辑思想是一段追寻中国思想史、文化史、文学史、编辑史源头的宝贵历程,“思无邪”是孔子对《诗三百》编辑思想的提炼,只是这三个字的含义与正文已经不一样了。“思”由没有任何含义的语音词引申为“思想”之意,“无邪”则意指思想纯正、单纯,意指《诗三百》是一部在思想上非常纯正自然的作品。这一编辑思想主要体现在编辑目的、选材标准和编排方式三个方面。她认为《诗三百》目的无邪,是为贵族阶层服务的;选材无邪,是忠于“美”的;编排无邪,是工整灵活、以类相从的。通过分析《诗三百》“思无邪”的编辑思想,提出“在孔子看来,《诗三百》并非不刊之论,‘思无邪’说明了《诗三百》还有进一步编校整理的空间”。

山东大学刘光裕《书肆诞生与书商作用边缘化》系统地考证了书肆诞生和书肆业务,他认为书肆与书商产生于西汉后期,书肆业务主要是买卖旧

书,为社会上冗余之书调剂余缺,互通有无,这也正是所谓的“书商作用边缘化”。书商作用边缘化归根结底是源于重农抑商政策,辅以士商对立和自给自足书籍经济的影响。在汉至唐的书籍出版活动中,书商作用边缘化与读者传写成为书籍流通的主渠道是相互关联的两件大事,也是影响最为深广、最具代表性的两件大事。明确出版业诞生和发展的的问题,明晰书商的业务和地位,有助于进一步探讨和追溯出版编辑史。

山东农业大学孙金荣《〈齐民要术〉版本与校勘存疑研究举要》指出,北魏高阳太守贾思勰撰写的《齐民要术》在最初的几个世纪是以手稿或另有手抄本的形式流传,唐代有无雕版印刷本未可知,公元11世纪有了迄今可知的第一本奉北宋皇帝之命的印刷本。此后,《齐民要术》的刊刻、印刷、传抄、校注时有发生。今人在《齐民要术》版本研究与校勘中,做出了显著成绩,但有的版本的传承关系还待商榷,校勘存疑的问题仍需探究。他梳理了《齐民要术》主要版本流传和版本的源流关系、传承关系,认为从北魏到北宋是有不同版本流传的,从北魏至隋唐五代传抄是持续的,可以肯定唐五代仍有抄本传抄。在校勘存疑上选取了“有”、“无”,桂阳太守、桂阳县令,银、钱、根,“舛”字衍缺等四则存疑问题加以辨析,并得出了明确论断。

济南大学陈静《敦煌诗歌写本的传播特征及其形成原因》以传播的角度考察抄本,从敦煌诗歌写本的传播特征和形成原因对敦煌写本进行考察,认为以此为视角,可以将抄本从文献学过于静止的状态中唤醒过来。她指出敦煌写本集中于8—10世纪,处于中国抄本(写本)时代的鼎盛期。探讨敦煌诗歌写本的传播,重在写本形态。敦煌诗歌写本以集抄类型的诗集为主,其传播特征体现为:手抄复制;诗集名称、作者、编者信息缺失严重;无明确的編集思想;抄写体制随意;异文现象突出。之所以形成这些特征,首先在于抄本时代以自抄自用为目的的读者传写模式;其次,由于抄本传播中“定本”观念的差异;第三要考虑到敦煌的地理位置与敦煌文献的特殊性。

国家图书馆程有庆《〈新刊剑南诗稿〉版本释疑》指出陆游诗集《剑南诗稿》在宋代曾刊刻过好几个版本,惜多湮没罕存。长期以来,两部宋刻残书极其引人关注,而其版本所存留诸多悬而未决的疑问,堪称陆游诗歌研究的一个学术遗案。他对宋刊《新刊剑南诗稿》的版本、内容情况做了两点补充,认为《新刊剑南诗稿》确为宋严陵郡斋所刊二十卷

本无疑,确实收有赋文一卷,其内容及分卷与明汲古阁本《剑南诗稿》前二十卷确实存有差异。

山东大学赵睿才《津阪孝绰〈杜律详解〉与〈夜航诗话〉互证类考》介绍到日本汉学家津阪孝绰所撰《夜航诗话》谈论杜甫最多的是杜诗的技巧,其《杜律详解》则专解凝聚此技巧的七律。二书重出之处颇多,找出其互证处并加以归类,不仅对梳理津阪孝绰治杜的基本思路有帮助,而且对日本学者喜欢杜诗的原因也有所窥知。他认为津阪治杜的基本思路为重视艺术形式技巧,阐释精益求精;博采众家之长,以佐己说。指出看中杜诗的艺术形式技巧,就在杜诗有规矩法度,可学。认为“详解”则专解杜甫的七律,是看到了杜律这样的特点,“诗话”所详谈者,正是“详解”所解之“诗法”。

北京印刷学院范继忠《在华耶稣会传教士“北堂藏书”原委综考——以“金尼阁藏书”为中心》以金尼阁“七千部西书入华”为主要线索,总体考述明末清初北堂藏书的背景、形成、演变及内容传播问题。“金尼阁藏书”作为耶稣会有计划地募书、转运、收藏并旨在翻译传播的来华西书精品,其缘起、形成、内容及历史命运成为明末清初天主教在华藏书史演变的缩影。对“七千部西书”的书目、本堂藏书整体结构和耶稣会拉丁文藏书的价值提出商榷性意见,即鉴于在华耶稣会“七千部西书”和北堂藏书的大部分内容尚未全面整理和翻译,与耶稣会教士本身创作作品和通讯集的活跃翻译出版活动不成比例,以拉丁文为主的这部分西方古籍的翻译和研究,应该得到中西文化交流史和出版史研究学者的进一步重视和学术投入。

上海交通大学江凌《试论晚清地方官书局兴起的文化逻辑》认为作为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重要工具——晚清时期,由胡林翼、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同治中兴名臣开其端,诸省督抚大吏倡其行或承其绪,职业经理人和校勘专家、刻工落其实,自下而上并受到清廷认可或饬办的官办图书出版机构——地方官书局的兴起,有其深层次的文化逻辑结构,在以“挑战—应战”为纽带的文化统治权、领导权之争的文化逻辑外,地方督抚、官绅的个体文化自觉与“个体—群体—国家”一体化的文化责任在晚清地方官书局的兴起中亦发挥了其核心作用。

中国印刷科学技术研究院张树栋《黄金时代的印刷史研究》认为,中国对印刷术起源与发展的研究不仅起步较晚,而且发展迟缓,究其原因因为中国古代历代统治者和文人墨客不重视科学技术的缘故。他通过对历史的回顾,对黄金时代的印刷史和

改革开放后 30 年的印刷史成果展开了系统的介绍,梳理了今后印刷史研究的内容和前景,指出今后印刷史的研究,必将与出版史的研究同步进行。强调要保护中国印刷文化遗产、捍卫中国印刷术发明权。

武汉大学欧阳敏《制度路径:出版史研究的一条蹊径——关于民国出版企业制度研究的文献综述》认为制度是重要的,它是制约行业、社会乃至国家发展的关键因素。中国出版史源远流长,出版文化灿烂璀璨。近代以来,出版的产业性质逐渐凸显,以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开明书店等为代表的企业在文化与经济的结合方面做得较好。尝试在研究方法上另辟蹊径,以制度(主要是企业制度)的视角研究近现代出版史,丰富了出版史的研究方法,认为对于未来的研究,研究者应该对档案资料、内部资料以及近现代文学和经济学相关论著中有关出版企业的史料进行“钩沉”。

苏州大学许静波《上海近代书业与三十年代中叶汉字改革运动》利用上海档案馆所藏上海书业同业公会档,审视上海近代书业如何出于“成本”的考量而应对国民政府教育部汉字改革运动。上世纪 30 年代中叶,国民政府教育部通令全国施行注音符号以及简化字,然而简体字改革遭到政界、文化界以及上海书业同业公会的诸多反对。虽有方案未尽完美的原因,但上海书业主要考虑简体字需要重新雕刻字模,浇铸铅字,成本高昂,库存压力极大,所以选择支持注音符号,而反对简体字。由于上海出版界执全国之牛耳,使得此次简化字推广无疾而终。

南通大学黄芳、南京大学张志强《〈中国评论周报〉上的商务印书馆英文广告初探》介绍了商务印书馆英文广告投放频率疏密有致、设计风格灵活整饬、主题类型丰富多样的独特之处,指出《中国评论周报》上的英文广告不仅有助于解读商务印书馆图书推广及营销策略,也为探析商务印书馆的英文出版提供了新视域。从广告文本表征来看,这些英文广告体现了商务印书馆独特的图书广告营销策略。从广告内容来看,各种类型的英文图书广告也揭开了商务印书馆英文出版的历史面貌。综观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有关商务印书馆的研究热潮,探讨其英文出版成就的论著较为有限。因此,《中国评论周报》上的英文广告或能为开启商务印书馆的研究新路径提供坚实的史料。

华中师范大学范军《作为“出版史”的中国近现代报刊史研究》介绍到中国近现代报刊史就是中国

近现代新闻史,中国近现代报刊史既是一种重要的新闻传播活动,也是重要的编辑出版活动。所谓“出版”,是将知识、思想或其他信息产品经过选择加工以后,以手抄、印刷或以其他方式复制在一定物质载体上,并通过出售或其他途径向公众传播的活动。完整的出版活动应该包括编著作品、加工复制、广泛传播几方面的内容。作为“出版”活动的中国近现代报刊研究多年来一直十分薄弱,众多中国出版史论著也主要以图书出版、图书出版机构和人物、事件等为叙事主体,这显然有其明显的缺憾。他提出从“出版”这个新的视阈、新的维度来重新考察、认识中国近现代报刊发展史,以期对报刊史和出版史有所丰富和开拓,促进中国近现代报刊出版史的形成和发展。

中国传媒大学李频《改革开放期刊史的实在与可能》指出,改革开放期刊史是对200年中国历史的断代性切割和总括性的主体凝炼,相比1978年以来期刊史、新时期期刊史、中国200年期刊的新时期阶段、改革开放阶段等其他称谓,这命名简明概要。期刊与改革开放的社会环境互动既是改革开放期刊史的主体内涵,也是推动这时段期刊发展繁荣的内生动力。他认为社会变迁以及由社会变迁引致的期刊与社会的互动是期刊历史分期的重要参照,表征和体现期刊业改革开放的期刊出版物、期刊人观念和行為等,是期刊历史分期的核心参数。

人民教育出版社刘立德《叶圣陶教材编辑理论管窥》指出,叶圣陶既是新中国中小学教科书事业的领导者、奠基人、开拓者,又是新中国中小学教科书事业的决策者、亲历者和见证者,为新中国教材编辑出版体系的创立和完善建立了不朽功勋。他的中小学教材编辑理论高瞻远瞩、鲜活生动、丰富多彩,主要包括:教材编辑工作使命神圣、责任重大;教材编辑要竭诚为读者服务,正确对待读者意见;教材编辑要注意统筹兼顾,加强计划性;教材编辑要集思广益、团结协作、精益求精;教材要图文并茂,坚持科学性、可读性、规范性统一。

山东美术出版社李晋《坚守“艺术范儿”,拥抱“新媒体”——浅谈美术专业出版的核心竞争力》指出新形势下出版业的发展,正面临以产业布局调整为核心的战略转型,如何从一家传统的美术图书产品提供商向艺术传媒综合服务商转变,是我们新的命题与目标。这需要在坚守“艺术范儿”的同时,拥抱新媒体,实现单一产品结构向多业态发展的转变。下一步,我们将以图书出版为核心,形成

细分领域的强势品牌与影响力;以高仿真艺术品为核心,形成艺术衍生品产业链;以“锐空间”美术馆、“艺术梧桐会互联网雅集平台”(网上美术馆)为核心,搭建新平台,成为艺术传媒综合服务商。

北京印刷学院彭俊玲《出版文化——出版文化遗产——出版文化遗产保护体系综论》对出版文化、出版文化遗产、出版文化遗产保护体系这三个概念的内涵和外延进行了探析,指出出版文化遗产是出版文化的珍贵遗存,出版文化遗产保护体系的构建是保护我国出版业文化遗产的根本。她认为对出版文化遗产诸问题进行基本理论探讨有助于我国出版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开展。

二、明清宫廷典籍与故宫博物院出版研究

国家图书馆赵前《浅议崇祯皇帝题跋本〈大学衍义〉》介绍明嘉靖六年(1527)司礼监刻本《大学衍义》,首有明毅宗朱由检(崇祯皇帝)题跋、清王士禛题跋;钤有“钦文之玺”、“广运之宝”、“崇祯宸翰”、“池北书库”等印鉴。他考证了《大学衍义》的撰写目的及书名由来,通过《四库全书》的收录和曾为乾隆皇帝的插架之物两点说明了该书的经典与重要。肯定了明毅宗朱由检和清王士禛题跋的价值,指出“若该题跋落‘王士禛’款,无疑是伪跋或乾隆三十九年以后过录者”。

北京师范大学于翠玲《西方书籍史视角下中国出版文化的特征——以清代官修类书〈古今图书集成〉为聚焦点》指出,西方书籍史的研究视角对中国出版史的研究颇有启发,一是置于世界书籍史(包括出版史)的长时段中进行比较,二是借鉴多学科的、跨文化的研究方法,三是以具体书籍为案例的出版传播及阅读史考察。她将《古今图书集成》置于西方书籍史的视角下,凸显了其在历史时段、印刷技术、书籍类型、运作模式、文本形态等方面所具有的中国出版文化的特征,认为这有助于回应西方学者所关注的中国出版史上的现象,为其理论观点提供了参照或矫正的例证。而刘光裕、林穗芳等先生有关中国出版史的研究成果具有开拓性及代表性,可以成为中国学者与西方书籍史研究进行对话的基础和参考。

山东大学何朝晖《从〈长春宫前后殿书目〉管窥清代后宫藏书》根据清内府抄本《长春宫前后殿书目》,对紫禁城内位于西六宫区域的长春宫及其邻近宫殿的藏书布局及特点进行探讨。介绍了美国国会图书馆亚洲部所藏抄本《长春宫前后殿书目》,

指出其应为晚清内府抄本,并以之为依据,结合宫殿建筑格局与功能,分析了清代后宫藏书的布局和特点。他认为长春宫等处的藏书具有清代后宫藏书来源多样,各殿藏书类型与其功能基本吻合,演义小说等书较受后宫读者喜爱,各殿藏书之间存在借调情况几点特征。《长春宫前后殿书目》为我们了解清代后宫的藏书和利用状况提供了宝贵的线索。

首都师范大学何峰《南巡、典籍编纂与文化控制》指出,康熙帝和乾隆帝先后进行了12次大规模南巡,前后延续了一个世纪。南巡期间,两位皇帝优容江南士绅、大规模召试江南文人才子,在江南各地接收或收集书籍名画,既达到了控制江南文化社会的目的,也在一定程度上为以汉文化典籍纂修刻印为核心的国家大型文化事业储备了人才和资源,如《古今图书集成》及《四库全书》的修纂。江南社会的文人和文献资源成为清帝王建立盛世文化的重要力量,这一过程中江南文化社会彻底融入清帝国文化体系。至南巡末期,为彰显南巡胜迹、犒赏江南文化社会,清王朝建立了江南三阁,以贮藏盛世文化典籍。这种回馈是吸纳之后的回馈,是在政府的组织和控制下,以江南士人为重要力量,对汉文化传统重新整理之后的集中回馈。

北京大学黄卉《清宫大戏(连台本戏)的编订与刊刻初探》指出,在清代宫廷戏曲研究中,清宫大戏(连台本戏)是一个热点,但是相关论文主要集中在《鼎峙春秋》《昇平宝筏》《昭代箫韶》《忠义璇图》等数部作品上,大多从单一剧本角度出发,探讨文本情节、文献版本,缺乏整体、宏观的视角。黄卉从清宫大戏(连台本戏)的内涵界定、编订和演出、抄录与刊刻、流布宫外及收藏等角度出发,理清清宫大戏(连台本戏)的整体数量和规模,从宏观角度把握清宫大戏(连台本戏)的文体特征、演进脉络、撰写体例,进而探讨其在清代宫廷戏曲中的地位。

铜仁学院杨春君《康熙朝〈政治典训〉纂修考》指出,清代敕撰书籍多数被刊刻,或被官私书记载,但仍有一些书籍既未被刊刻也未被记载,其中,《政治典训》就属于此种情况。康熙二十四年,应臣工请求,康熙帝同意编纂《政治典训》一书。该书汇集康熙帝的圣政,用以教训臣工。但在康熙朝,《政治典训》一直在纂修中,直到雍正间才纂修完毕。他介绍了《政治典训》的纂修过程、性质与内容和纂修官员,认为《政治典训》体例同“训”类书籍如宝训、圣训一样,都是辑录皇帝语言,是皇帝的言论专集,但《政治典训》的内容比宝训、圣训的内容更加

广泛。对于该书为何经过长时间编纂仍未被刊刻还需另文探讨。

东南大学许丹《〈御纂医宗金鉴〉编纂考》谈到《御纂医宗金鉴》是乾隆初年由政府组织编写的一部医学丛书,从下旨修书到书成,经历了三年的时间。此书的编纂目的是树立医学正宗,用于临床指导和教学需要。这部书由一个将近百人的集体共同完成,编纂人员既要精通医术,又要兼通文理。御医吴谦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清廷在太医院衙门内还专设医书馆修书,此书的编纂经历了从征书到开馆到书成的一系列步骤,其间经历了一些波折,虽然最终完成了《御纂医宗金鉴》,然而与初始的修书计划仍存在一些差距,也算是一个未尽的遗憾。

北京市社科院满学所晓春、故宫博物院图书馆春花《论〈四书〉满文译本源流》以《实录》《会典》《钦定学政全书》《起居注》《黑图档》等原始资料为依据,探讨清代满文《四书》的各种版本。她们系统的梳理了康熙年译《四书章句集注》乾隆年两度翻译《四书》、翻译《四书讲章》《日讲四书解义》等皇帝用书编纂翻译过程,以展示清代满族被儒家文化熏陶的过程。她们认为我国《四书》的思想体系、价值体系是老祖宗遗赠于子孙后代的宝贵遗产,有助于引领人们感悟人生真谛,走上幸福的人生之路,对提升人们的思想境界和道德修养有很大的启示。于今日挽救人心颓败,醇化士子及扭转拜金主义思想蔓延,均具有教化作用,它的文化魅力和实用价值是经久不衰的。

故宫博物院章宏伟《民国时期故宫博物院出版事业的发展及其评价》指出,由于既往关于故宫出版的研究对故宫院史缺乏了解,致使研究出现了一些错误。首先要统一讨论的口径,如将清室善后委员看做故宫博物院的前身,但前期的古物陈列所不在故宫之列;1937年北平沦陷以后,故宫博物院北平本院的出版是在侵华日军控制下的出版;文物西迁阶段的故宫几乎没有出版;工作报告、纪念册等故宫内部文件应予以剔除;对于报和刊要跟学界界定统一;故宫委托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两部大书应予剔除;杂志的抽印本不作为单独的出版物讨论。章宏伟将民国时期故宫博物院24年的出版物全部按年来统计整理,并总结各阶段出版的特点。他认为现有关于民国时期故宫出版的评价多有夸大,故宫博物院作为一家出版单位,出版远远没有达到成绩斐然的地步,只能说在民国出版史上具有特色而已,无论其经济投入、出版数量,都不能无限拔高,

内容上缺乏学术创新,编纂水平不高,有诸多疏漏,同样需要予以正视。

故宫博物院张小李《民国时期清宫旧藏“金薤留珍”古铜印的钤拓及衍生出版》指出,1925年故宫博物院成立后,其下属古物馆传拓了大量的宫藏鼎彝铜器、印谱等器物发售,以惠及学界、公众。传拓品中规模最大的是《金薤留珍》古铜印谱。“金薤留珍”古铜印是乾隆帝下令整理的宫藏古铜印,古物馆集中精干力量,历时3月才钤盖完成。后又将拓本影印出版,并选编部分印章编印了《印谱日历》。故宫博物院还对该谱积极宣介推广,在《故宫周刊》全文连载,并将该谱送西湖博览会展览。他从故宫博物院古物馆的传拓活动引申出传拓品中规模最大的《金薤留珍》古铜印谱,并详细讲述了古铜印的钤拓和衍生出版物,认为在艰苦和动荡的环境中,故宫仍将这一文化精品通过传拓、出版等文物流传形式向学界和社会积极推介,高质量地履行了文化保管机构的传播职能,为我们留下了这批国宝的身影。

故宫博物院朱赛虹《古籍索引的个性化定制——以〈清代御制诗文篇目通检〉为例》结合《清代御制诗文篇目通检》的编纂实践,从古文体裁和题材的丰富性和多样性入手,论证古籍索引“因书而异”的传统,正是因为古代文体和题材的丰富性,才决定了索引的多样性,并且这一索引具有个性化、灵活性和适用性。她还探索了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定制”与创新。她认为由于当今信息数字化技术的发达,寄希望于未来能用数字化技术开发一个“清代御制诗文全文检索数据库”,达到对御制诗文题名和内容进行“字字可检、句句可查”的理想效果。

三、刘光裕《先秦两汉出版史论》

研究及评价

河南大学姬建敏《论刘光裕的编辑学研究及其创见》对刘光裕的编辑学研究及其创见进行梳理和总结。刘光裕是我国当代著名的编辑学家,其对我国编辑学研究的贡献,主要表现在编辑学基本理论研究和编辑出版史研究方面。其创见一是从出版本位出发,提出了以出版编辑为本位的编辑观;二是深入论述了编辑学重大理论问题,形成了较为系统的编辑学学科理念;三是重视编辑的社会文化关系研究,开创了编辑学“中介服务派”;四是提出了“有出版才有编辑”的编辑史观。

暨南大学姚新勇《遍览群书为出版立传,身居

斗室薄凌云之志——读刘光裕先生〈先秦两汉出版史论〉》明晰了《先秦两汉出版史论》的创作架构,认为这是一部真正意义上的“出版史”专著,研究对象具体明确,问题内涵外延清晰,概念起点与逻辑结构内在统一,史料丰富详实、方法论自觉得当,论证思辨而严谨有力。

南开大学刘运峰、段煜《一部平实而严谨的心血之作——刘光裕教授〈先秦两汉出版史论〉读后》从对书籍的载体研究、对书籍传播环境的梳理、对中国出版史研究方法和研究对象的创新与突破三个方面介绍了《史论》,指出刘光裕教授的这部著作,从图书载体的演变、传播环境变迁的视角出发,详细论述了简册的发展历程、纸张的出现与推广、官书制度的发展变化以及秦汉两代的书籍流通情况,对先秦两汉时期的出版历史进行了梳理与总结,丰富了出版史的研究内容,平实而谨严,对于出版史研究的深入开展做出了贡献。

汕头大学燕世超《我国古代出版史开山之作——论〈先秦两汉出版史论〉的研究方法及其对我国古代出版史的阶段划分》认为,《先秦两汉出版史论》是刘光裕教授20多年心血的结晶,是我国古代出版史开山之作。该书的问世,除了得力于作者多年辛勤劳动,还在于其科学的研究方法和严谨的治学精神。从科学的研究方法出发,认为成果的取得来源于三大方法,一是仔细考证、证伪,形成可靠的论据,二是对书与文字其他载体的区别做出科学界定,三是既要与国际概念接轨,又要立足于中国国情。刘光裕先生抓住了流通这一关键环节,对我国出版史阶段做出科学的划分,持之有据。

外文出版社张洪《从刘光裕老师的方法论看佛经出版在中国出版史上的意义》套用刘光裕先生“将出版置于特定的社会历史环境中考察,乃是出版史研究的基本方法”来探寻中国出版与宗教的关系,认为这一方法论可以帮助我们更恰切地认识中国出版的源头,可以启发更多学者深入发掘此类课题,并从人类出版的“第一推动”——宗教中了解我们的文化基因是如何运作的,继而从中挖掘出更多的历史真相,以此来丰富我们的文化传承。

广西师范学院卢有泉《先秦两汉出版史研究的新创获——读刘光裕先生的〈先秦两汉出版史论〉》指出《史论》一书具备三大特色,一是不单纯就史论史,而是将出版活动融入当时的社会、政治、文化等之中进行考察,具有开阔的治史视野;二是注重个案和细节研究,突出一个时期的出版重心;三是注重史料的挖掘,史料翔实,以史带论,论从史出。他

认为该著以现有的先秦两汉出版史料为依据,在充分吸收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该时段存在的一些书籍出版史事和理论问题进行了具体的、细化的研究和总结,填补了该领域研究的不少空白点。尤其是能将一些具体的出版谜题放在当时社会文化的大背景下探究,将出版史与文字史、造纸史、印刷史等相关学科融合起来进行研究,使整部著作内容丰富、史料翔实、考证严密、新见迭出,体现了一种特有的学术气派和范型,堪称近年来出版史研究领域的一大创获。

烟台市烟草专卖局郭术兵《〈先秦两汉出版史论〉学术贡献管窥》介绍了《史论》的理论创新贡献、学科体系建设贡献和方法论贡献,认为《先秦两汉出版史论》揭示了官书三特征及其社会影响、“书商边缘化”现象及成因、中国出版史的四个分期、汉唐

抄本的基本过程、在出版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和革命意义的一系列重大事件等“五大发现”,在理论创新上实现重大突破;科学地界定了“出版”概念,首次明确了出版史的研究对象和范围,为出版史学科体系建设作出重大贡献;采用将出版置于特定的社会历史环境中考察的基本方法,以及“先搞资料,然后再撰写”、把出版志力量与高校力量相结合、实事求是、因地制宜等具体研究方法,对治史具有重要借鉴价值。作为《中国古代出版通史》的开山之作,为中国出版史研究作出重大学术贡献。

会议论文集还收录了章宏伟的论文《南宋书籍印造成本及其利润》,刘光裕、陈静的访谈《我与中国古代出版史研究——刘光裕访谈》。

(责任编辑:闫卫平)

(上接第 23 页)

Xunzi's Theory「Evil Nature」 ——A Comparative Study of Contemporary Hong Kong and Taiwan

LIU Min-jiao

(School of Philosophy, Fudan University, Shanghai 200060, China)

Abstract: In the history of Confucianism, the theory of “evil nature” is usually regarded as an important mark of the studies of Xunzi’s theory. Compared with Mencius’s theory of “good nature”, the theory of “evil nature” has always been criticized by many scholars. In the criticism of the “evil nature” at present, the core of the problem is focused on the seemingly intractable paradox of “evil” and “good”—Since Xunzi thinks that human nature is evil, how can we explain the moral basis and possibility. Taking this issue as the main clue, this paper summarizes some representative research achievements of contemporary Hong Kong, Taiwan and mainland China. The study of Xun has gained abundant research results on the basis of answering the question of foundation of “good” by detailed analysis of “nature” to illustrate the real meaning of “evil nature”, understanding the problem of “good” from “pseudo” and “heart”, and the way to construct moral righteousness from the moral autonomy and the objective righteousness. Through this summary comparison, I want to put forward reference for further research with the hope of development.

Key words: Xunzi; Human Nature Theory; Evil Nature; Morality; Good